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论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

陈昭方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当代世界经济一条带普遍性的重要规律。运用这条规律分析当代世界经济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发展和变化以及其走势极为重要。列宁曾经指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第一次发现并论证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在此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已有过论述，初步形成了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思想。他们的这些思想为列宁发现和论证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和创立帝国主义学说奠定了基础。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为了捍卫和继承列宁的学说，在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对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刻地阐述和解释。毛泽东和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也有过论述。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运用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并发展了这一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尽管只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局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论述主要也是集中在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上。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体，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扩展和延伸，因此，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论述，以及由他们创立的这一理论的体系和方法，对分析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发现并论述了资本主义的个别企业、个别部门、个别行业之间的不平衡，初步构成了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思想，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资本主义企业与企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资本主义的单个企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最基本的单位，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平衡，必然首先会表现为资本主义企业与企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大家知道，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通过剥削雇佣劳动来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决定了资本主义企业在这种基础上和推动下它的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首先，有一部分企业，由于它们的资本积累特别迅速，于是这一部分企业就会比其他的企业发展得快。其次，另有一部分企业则发展得慢一些，甚至有一部分企业发展得非常慢，它们的发展落后于竞争能力较强的企业。最后，还有不少企业，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减产，甚至破产和倒闭。与此同时，所有的企业，不论是向上发展的企业还是走下坡路的企业，都绝对不是不间断地、平衡地发展的。如发现进一步改进生产的秘密甚至一个成功的广告活动就能使一个企业飞快地扩大自己的生产，阻止竞争对手的发展，使对手受到排挤，乃至缩减生产。这样，一夜之间竞争对手的作用就改变了，他们的企业发展的情形也发生了变化。因此，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整个过程必然是跳跃式的，迅速的增长和缓

慢的发展互相交替着,而且在竞争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下降和停滞。可见,企业之间不平衡的发展意味着企业不是彼此按比例发展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在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不同领域之间的必要的平衡和相互联系,它们之间的限度和比例的建立,除了通过经常不断地消除经常的不协调之外,用别的办法又怎么能够实现呢?”这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力量对比关系是经常变化的,一些企业的发展往往是依靠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压制和排挤其他一些企业来实现的。对于这一点,恩格斯也指出,“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

第二,资本主义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对于这种不平衡,马克思很透彻地阐明了它的原因。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的信中指出:为了生产“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使付出各种不同的和数量上一定的社会总劳动量”。由此可见,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之间“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客观“必然性”。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这种分配是直接进行的,而且主要是在原始公社、奴隶主大庄园和经济部门之间直接分配它所拥有的全部总劳动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在各部门之间按照社会所需要的比例直接分配社会总劳动。这种分配首先是自发进行的而不是有意识地进行;其次,是间接进行的,即通过劳动产品在市场上交换而进行的。因此,资本主义各生产部门的发展是通过经常破坏社会所需要的总劳动量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进行的。需要投入的劳动同实际投入的劳动之间的协调经常遭到破坏,只是在这个过程中的瞬息时间里才会出现协调一致。通过经常破坏社会所需要的国民经济总产品量的分配而进行的资本主义各生产部门的这种发展,实质上正是经济上发展的不平衡。

二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论欧洲联邦口号》《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著作中,深刻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发现并论证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他指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十月革命的成功,完全证明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理论的正确性。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在同反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写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再论我们党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等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理论,概括起来讲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表现和特点。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年代还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因而他们只是看到和一般地分析了资本主义企业与企业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不平衡,不可能发现和全面阐述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各种表现与形式。根据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的新情况,列宁不仅更加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在企业与企业、部门与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而且还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与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他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国家在经济上平衡发展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工业中的危机和政治中的战争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恢复经常遭到破坏的均势。”他还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工业部门和各个国家的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列宁的上述分析,更加全面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平衡,不仅表现为各个企业之间、各个部门之间的不平衡,而且重要的是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科学地阐述和论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对于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各种矛盾、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重大问题和现象奠定了基础。

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由于经济条件的不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不仅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列宁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特点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上。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跳跃性。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企业、各个工业部门和各个国家的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跳跃式的。”还指出:“从前的‘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被现代的帝国主义时代所代替的基础是什么,这就是自由竞争已让位于资本家的垄断同盟,整个地球已被瓜分。显然,这两件事实(和因素)确实具有世界意义:当资本能够畅行无阻地扩大殖民地和夺取非洲等处未被占据的土地,而资本的集中还很薄弱,垄断企业即庞大到能够控制某一个工业部门的企业还没有产生时,自由贸易与和平竞争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种垄断企业的发生和发展……使以往的自由竞争成为不可能了,并且破坏了它的基础,而地球的瓜分

又迫使从和平扩张转到武装斗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现在已不能象过去那样的资本主义稳步地发展和逐步向新的国家扩展比较平静、文明、和平的环境中生活了，因为另一个时代已经来到。金融资本正在排挤这样的国家，并且一定会把它挤出大国的行列，夺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这就是说，在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尚未高度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也还不高，企业规模还比较狭小。这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虽然也是不平衡的，但总的说来，发展还比较缓慢和平稳。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要经过较长的时期才能赶上和超过比较先进的国家，例如18世纪英国超过荷兰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就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此后，英国工业在一百多年中一直保持领先地位，直到1870年，还没有一个国家超过它。同时，在自由竞争阶段，世界领土尚未瓜分完毕，发展较快的国家尚有扩展的余地，可以在不通过世界规模的军事冲突的情况下，赶上或者超过另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垄断的形成和发展，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再是自由竞争阶段的“渐进式”的，而是“跳跃式”的，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对于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具有推动和阻碍的双重作用。在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市场，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则尽量采取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使本国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而在那些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垄断阻碍着新技术的采用，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出现停滞趋势，并且由于这些国家大量的资本输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经济的发展。这就造成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能够跳跃式地较快地赶上和超过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从而在经济实力的对比上发生急剧的变化。例如，英国在1870年以前在世界工业中一直占第一位，号称“世界工厂”，法国次之，德国和美国还只刚刚走上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舞台。但是，当时英国的工业主要是纺织、采煤等旧工业部门。随着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新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的工业部门不断出现，10年以后，即到了19世纪80年代，善于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利用外资的美国，大力发展新兴工业部门，迅速赶上了英国，跃居世界工业生产的第一位。大约20年以后，即到19世纪末，另一个新兴工业强国德国也超过了英国，跃居世界工业生产的第二位。这些情况表明，在自由竞争时期，一个国家的经济赶上或超过另外一个国家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而在帝国主义阶段，一个国家赶上或超过另外一个国家的时间则大大缩短，呈现出跳跃式和急剧变化的特征。二是资本主义实力的均衡化。在论述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这一特点时斯大林曾指出：“技术的空前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水平的日趋均衡，使一些国家可能并易于以跳跃式方式超过另外一些国家，使很不强盛但在迅速发展的国家可能并易于排挤比较强盛的国家。”这就是说，在垄断阶段，由于技术的空前快速发展，有可能使落后的国家加速自己的发展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与原来比较先进的国家的均衡，在取得这种均衡后，原来比较先进的国家为了保持自己的先进，而原来比较落后的国家则要超过原来比较先进的国家，这样斗争就会尖锐起来，于是便造成了一些国家超过另一些国家并把它们从市场中排挤出去。因此，均衡化并不使资本主义发展趋向缓和，恰恰相反，“均衡化是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加剧的条件之一。”¹⁰

第二，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作用和后果。应该说，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在垄断阶段与在自由竞争阶段相比不仅其表现和特点不同，而且这一规律所起的作用也不同。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中曾指出，“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多少平衡地向上发展，向还未被它占领的新的地域扩张，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¹¹这也就是说，在自由竞争阶段，虽然资本主义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但大体上还是相对平稳地向上发展的，而且有向上发展的“空闲”领地，因为此时世界上的领土还未被瓜分完毕。因此，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还缺乏充分发挥的条件。而在垄断阶段，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是跳跃式的，因而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赶上或超过原先比较先进的国家；另一方面，世界上的领土此时已被瓜分完毕。因此，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就必然要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了。

对于这一情形，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作了深刻的剖析和论述。列宁具体地分析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英、俄、法、德、美、日等六国对殖民地占有、瓜分和扩张的情况。在1876年以前，上述6国共瓜分世界领土面积4040万平方公里，俄国1700万平方公里，法国90万平方公里，其中英国2250万平方公里，而德国、美国和日本此时根本还没有殖民地。到了1914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上述6国的殖民地领土扩张增加到6500万平方公里，增加一半以上，净增领土2500万平方公里，比上述6国1650万平方公里领土面积多出一半。其中，德、美、日、法获得的殖民地面积达1410万平方公

里,大致等于欧洲面积的1倍以上。针对这一事实,列宁一方面指出,19、20世纪之交时“世界是分割‘完毕了’”,另一方面又指出,“殖民地领土扩张是非常不平衡的。”⁴²列宁还详细分析了美、英、俄、德、法五国铁路的情况,指出这五个国家所拥有铁路总长度已占世界铁路总长度的80%,其中英国靠自己的殖民地,把自己的铁路网增加10万公里,比德国增加的多出了3倍。然而,在这一时期,德国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煤炭和钢铁生产的发展比英国快得多,比法国和俄国发展更快。在作了上述分析后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极不相适应的情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⁴³他还进而指出:“铁路网分布,这种分布的不平衡,铁路网发展的不平衡,就是全世界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总结。这种总结表明,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⁴⁴列宁的分析和论述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由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一些落后的国家较快地赶上和超过了原先比较先进的国家,然而,在世界市场上,在世界的势力范围的划分上,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因为这时世界已经被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完毕,世界上已不再有“空闲”的未被占据的土地。为了扩展各自的势力,为了打破这种不平衡,那只有有一种选择,即通过武力从别的国家夺取这些土地。由此,帝国主义战争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和爆发。正如斯大林指出的那样,“各个帝国主义集团的势力范围的旧的划分总是和世界市场上新的力量对比发生冲突,为了在势力范围的旧的划分和新的力量对比之间求得‘平衡’,必须通过帝国主义战争来周期性地重新瓜分世界。”⁴⁵

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指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这是因为,在垄断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充分地发挥作用,必然引起和爆发帝国主义战争,而帝国主义战争的结果,必然是社会主义可以在少数或单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对于列宁的科学论断,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作了详尽地阐述。他首先指出,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多少是平衡地向上发展的,和向还未被它占领的新的地域扩张的,因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还不能充分有力地发挥作用,所以“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某一个国家内不可能胜利,它只有在所有的或大多数的文明国家内进行共同的攻击才能胜利。”接着他又指出,人们明白了,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显然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战争揭露了世界帝国主义阵线的无法克服的弱点,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预先就决定了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时间不同,这时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出结论:在新的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完全可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内同时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些国家内革命的成熟是不平衡的。”⁴⁶因此,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少数或某一个国家获得胜利。这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在垄断阶段上充分有力地发挥作用所产生的结果。

以上的分析说明,在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及其后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一规律作用的结果必然引起帝国主义之间爆发战争,二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结果必然是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少数国家中获得胜利。这两种结果密切相关,共同构成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在垄断阶段作用和后果的主要内容。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已分别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所完全证实。对于这一历史事实,斯大林1926年在《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一文中有一段精彩的概括:“帝国主义世界战争是重新瓜分已被瓜分的世界的初步尝试。这次尝试使资本主义付出的代价是俄国革命的胜利与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内的基础的破坏。”⁴⁷“不用说,继续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尝试之后必然有第二次尝试,并且帝国主义阵营已在进行这种准备工作。”⁴⁸“无庸怀疑,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二次尝试将使世界资本主义付出的代价比第一次大得多。”⁴⁹“从帝国主义条件下的不平衡规律看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前途就是如此。”⁴⁷

第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形成的条件和原因。无论是自然规律,还是经济规律,都有其产生和形成的客观基础和条件,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也是这样。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⁴⁸他还指出:“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一个经济部门,在市场的统治下,都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均衡的发展。”⁴⁹列宁的论述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产生和形成的客观基础和条件是商品,即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及市场的统

治。应该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也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统治，资本主义生产在企业之间、部门之间也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但此时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统治却未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形成和产生的基础和条件，因而在自由竞争阶段不能产生和形成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这是为什么？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这是由于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由此并出现了不同于自由竞争阶段上的许多经济特征即帝国主义经济特征。由于经济条件的不同，从而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统治成为产生和形成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客观基础和条件，所以斯大林指出，“只有二十世纪初叶才能发现和论证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⁴⁰

应该指出的是，列宁还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特点出发，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产生和形成的条件和原因。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指出：“假如资本主义能发展现在到处都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农业、假如资本主义能提高在今天这种技术惊人进步的情况下仍然到处是半饥半饱、乞丐一般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那当然不会有什么过剩资本了，……但是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和民众的半饥半饱的生活水平，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根本上必然的条件和前提。”⁴¹这就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

三

毛泽东、邓小平是继列宁、斯大林之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也有诸多论述并为发展这一理论作出了贡献。

第一，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论述并运用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理论。这主要见于他的《矛盾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著作中。1937年8月，毛泽东继7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演讲《实践论》后，又给军政大学的学员讲了《矛盾论》。毛泽东之所以在两个月之内作《实践论》《矛盾论》的演讲，主要任务之一是要纠正当时中国共产党内某些危害革命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当时要纠正的这些错误思想是教条主义思想和经验主义思想，尤其是教条主义思想，它曾经使中国革命在1931年至1934年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教条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为此，毛泽东在进行了《实践论》演讲之后又作了《矛盾论》的演讲报告。毛泽东认为，各种物质运动中的矛盾，都带有特殊性。他说，“所有这些物质运动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质上互相区别的。每一个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特殊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的存在着。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矛盾和特殊的本质。”⁴²由于事物的特殊性，使得一事物与另一事物具有不同的本质，这种不同的本质，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还举例，说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不同的。正是由于矛盾的特殊性，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面情况上，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就是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完结之日，是不会消失的，但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各个发展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因此，“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⁴³毛泽东运用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分析资本主义的矛盾后指示：“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个阶级的矛盾激化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⁴⁴毛泽东上述的讲演，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已经打响，他从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出发来分析世界资本主义社会，指出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特别尖锐起来和激化起来以及引起的原因，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帝国主义及其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和怎样对待这场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运用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理论指导中国革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制定革命的政策和策略，还体现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方面。他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种破裂，表现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这种情况，基本地说来是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增大了这种

破裂的可能性。⁴⁵这里，毛泽东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来解释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正确分析和说明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条件下会倾向抗日，从而从反动派的立场上分化和分裂出来，站在人民革命、坚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立场上的可能性。这对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制定正确的政治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邓小平论证和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1974年4月，联合国举行联大特别会议，主要讨论世界原料和发展问题。这次会议是联合国成立29年后第一次举行专门会议讨论反对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改造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问题。当时任我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出席这次大会，并于4月10日在会上发言，全面阐述和论证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邓小平说：“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现已不复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⁴⁶在战后出现三个世界，这既是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也是发展不平衡在国际经济关系上新的表现和新的特点。事实上，战后所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已经是完全不适应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不平等、不公正的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它的产生，是在当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处于无权地位的历史条件下，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按照他们的意志、利益和需要建立起来的，因而具有极大的不合理性。从政治上讲，是由极少数大国操纵和控制国际事务，大肆干涉别国内政，造成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从经济上讲，经济贸易和国际分工极不平等，存在着国际资本的严重剥削现象，致使国际经济关系失去平衡，造成南北差距更加扩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从军事上讲，极大地助长了军备竞赛，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造成动荡因素增加，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局部战争接连不断，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彻底改造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不仅仅是世界各国人民普遍的迫切要求和愿望，而且是世界历史前进的、必然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之路。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邓小平在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上表达了第三世界要求改变这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强烈愿望，并提出了六项合理的改革建议。六项改革建议的核心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关系和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和阐述这五项原则。1988年9月21日，他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的谈话时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⁴⁷同年12月21日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又说过，“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⁴⁸

注释：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II），6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3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 13 14 18 21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709、708、783、783、635、801、817、873、873、7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9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7卷，1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0 15 17 20 《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上卷，576、575、533、534、5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 16 《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533、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2 23 24 25 《毛泽东选集》，第1卷，309、314、314、1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6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报告》，载《长江日报》，1974-04-11。
27 任正德、邵汉德、吴建新主编：《当代世界政治经济》，386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
28 《邓小平文选》，第3卷，2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

（责任编辑：曾国安）